

往事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第二十三期 二零零五年九月三十日

编者的话：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八日，一架飞机飞临黑云压城的西安上空，它投下的不是炸弹，而是四十万份《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对于“充斥着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的西安城，这篇社评无异于一贴清醒剂，使狂热的官兵们冷静下来，也给进退两难几近崩溃的张少帅指出了一条路。在各方的努力下，一场迫在眉睫的内乱消弥于无形，但历史却在这无形之中被彻底改变了。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在中国的历史中，枪杆子不但出政权，而且出道理——但这回《大公报》的秀才要给北军的丘八们说道理，不但说清了，而且深入人心，那雪片般漫天飞舞的报纸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一道奇观。

何以至此？无缚鸡之力的秀才们两手攥空拳，仅一腔热血加一枝秃笔，何以能干预历史？因为他们发出的是独立的声音，是出于公心的持平之论，超脱于党见和私利之上，既有铁的逻辑，又有仁爱体谅的热心肠，难怪叛乱的官兵说，连《大公报》都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可见《大公报》之深入人心。

关于那段历史，我们从来不知道“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业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是痛骂！”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改变了国家命运的一大疑案。

它究竟是一个混迹于歌舞场的纨绔搬演的“英雄造时势”的闹剧，还是一个爱国者被国仇家恨冲昏头脑因而产生的过激行为？张少帅是“千古英雄”，还是“千古罪人”？他是受党影响，还是受党领导？或者如张季鸾、王芸生的判断，他不过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他要做的是“投靠苏联”？《大公报》社评中那“蕴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究竟何指？

少帅一介无战功的武夫，平生两件大事，一是“武装调停”中原，一是发动西安事变，都是兵不血刃，翻云覆雨，前者背冯阎趋蒋，此番背蒋欲趋谁？

少帅之所以“随节来京”，是“《连环套》看得太多了”的义气，还是摆脱危机的无奈？究竟是军法森严的南京可怕，还是杀机四伏的西安凶险？

明的、暗的，国内的、国际的，国民党、共产党，政府的、民间的，到底有多少势力纠缠其间？

西安事变已过去七十年，那篇曾在西安上空漫天飞舞的文字，尽管未臻完美，但持论正大，悲天悯人，即便现在读起来，仍让人心潮起伏。

略论《大公报》与西安事变

王芝琛

引言

应该说老一辈人中，一提起《大公报》与西安事变，都会想到，在西安事变发生后第六

天，即1936年12月18日，在西安的上空洒下几十万份当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该社评在西安乃至全国引起极大反响，同时也把《大公报》与西安事变联系在一起。

12月12日当晚……

总编辑张季鸾看到关于西安事变的电讯稿，顿时一改平时总带微笑的面容，变得十分严肃，并叫人请编辑主任王芸生到他办公室。张季鸾看到王芸生后第一句话就说：“陕变是有人策动的。”并表示，“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蕴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阴险。”王芸生完全同意张季鸾的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办报人，在西安又有常驻记者，诸如洛川会晤早有所闻……。

他们也十分清楚，张学良想投靠苏联，依靠苏联的金钱和武器，重振东北军。

基本评价：

爱国主义乎？亡国主义也。

在整个西安事变进程中，总编辑张季鸾共写下十一篇社评。张季鸾严肃地指出：张杨之变并非爱国主义，实则亡国主义。例如在12月16日发表的第三篇社评《望张杨觉悟》中说：“张杨此举，或自谓为救国，实际则为速国之亡；或自谓为联合团结，实际则为促国家之分裂”。

时任编辑主任的王芸生，在《大公报》的重要新闻周刊《国闻周报》发表了《前进吧！中国》与《六寄北方青年》中对西安事变都有阐述。王芸生说：“我以为事情很简单，无论何党何派，你既标榜‘救国’，便不应该使用亡国手段。西安事变的手段是怎样的？开后门，拆烂污，简直是败战主义。我们以五年的忍耐与努力，才做到现在这个可以抬头见人硬嘴说话的样子。我们应该继续苦干，继续努力，才能挺腰，才能翻身，怎好自己扯后腿，栽跟头？”（见《国闻周报》第14卷第2期《寄北方青年》。）

12月20日胡适先生在津沪《大公报》发表了题为《张学良的叛国》的星期论文，该文题目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张学良的行为是叛国，而决不是什么“爱国”。

《大公报》论中共

关于中共自西安事变以来所表现的态度，王芸生在《三寄北方青年》（《国闻周报》第14卷第5期）一文中说，我也得到不少相似的资料，但同时也有许多矛盾的东西。在西安事变后的两三天内，我见到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一张传单，文字的要点大概说：“不杀某贼，中国不能抗日；不打倒汉奸政府，革命没有前途。”同时收到陕北红军的广播无线电报，也是对张学良的行动喝彩的。假使我见到的传单是真的，收到的电报没有错，无疑的，共产党又犯了严重的错误。“洪波震壑，川无恬鳞”，在这样一个大风波中，共产党岂能无所动静？既动矣，又岂能无所错误？不过共产党是从群众中生长出来的，应该能善察群众的心理。在西安事变中的群众情绪是怎样的？这是天下共见的，群众所表现的情绪是：对蒋委员长的关切，对张学良的愤怒，对国家的热爱。我想共产党的眼睛是雪亮的，应已察知群众的情绪赶快纠正了错误。这是对的。

12月18日的西安

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发表了由总编辑张季鸾撰写的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后，宋美龄所主持的航空委员会，当天即派出飞机，带了这张报四十万张（注一）飞临西安上空散发。一时间西安的上空与地面，《大公报》社评飞扬。

社评悲愤地说：“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社评更进一步设身处地，语重心长地说：“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唯一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多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

散发的社评效果如何呢？下面引述一段陈纪滢（注二）著，1974年由香港掌故月刊社出版的《胡政之与大公报》中言：“所有东北军及杨虎城所属看了这张传单式的社评，马上转变了态度。张杨二氏的心理，也立刻起了急剧变化。后来笔者亲自遇见当时参加事变的几位东北高级军事将领，他们描述那传单的功效时说：‘我们看了这篇社评，又感动，又泄气。那篇文章说得入情入理，特别把东北军的处境与其遭遇，说得透彻极了，所以我们都受了莫大感动。但大家又说：大公报不支持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我们便拿着传单去见副司令，进了房间，见副司令正在阅读那上边的文章，他看完了之后，神色也变了，立即召集会议，讨论一切……’”，“如今参与其事的将领，还有在台湾的，一问便知。所以大公报这篇《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成了近代历史重要文献之一，其所发生的功效绝对大于楚汉争霸中的‘楚歌’”。我们由此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到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确实在西安军民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张季鸾、王芸生都认为 张的悔过是真诚的

12月16日中共和平使者代表团抵达西安。他们的抵达，似乎变成了整个西安事变的策划者是张学良，准备杀害蒋介石的刽子手也是张学良。张学良此时此刻，思潮起伏，匪夷所思……，正在这个当儿，下面的军官送来了从天空中飞下来的《大公报》社评。张学良开始考虑下一步棋该如何下，已是火烧眉毛的事了。

西安事变发生急剧的转变，张学良不仅放蒋并亲自送蒋回洛阳最后到南京。令人瞩目的张学良这一大胆的举措，竟然瞒过了杨虎城，也瞒过了周恩来。

事变后，张学良即将被软禁之际，在上海《大公报》编辑部，张季鸾与王芸生有一次长谈。他们两人一致认为，张学良12月26日亲笔写给蒋介石的悔过书，并非“违心之作”，起码在当时是相当真诚的。他们两人都被悔过书所打动。张学良的悔过书如是说：“介公委座钧鉴：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违犯纪律大罪。兹腼颜随节来京，是以诚恳领受钧座之责罚，处以应得之罪，振纲纪，警将来。凡有利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也。学良不文，不能尽意，区区愚忱，伏乞鉴谅！”

张、王二人为何肯定悔过书是真诚的呢？他们认为，最大的明证乃是张学良背着杨虎城，也背着周恩来，冒死送蒋回南京。张学良自认只要他真心悔过，拥蒋抗日，蒋是会念旧情的。他们二人还认为，目前蒋正在积极准备对日全面作战，正需要像张学良这样的抗日杀敌虎将。谈到此，激动的张季鸾突然放声说：“走，去见蒋力谏放张！”

后来，张季鸾乘蒋介石庐山避暑时，草草行装前往庐山，蒋介石在“美庐”会见了张季鸾，当蒋得知张季鸾是为张学良说情时，满脸严肃无表情，而当张谈到张学良的悔过是真诚的时候，略见蒋的面部表现稍稍有点变化，但很快又恢复了如前之态。张季鸾动情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但蒋仍十分镇定，毫不动声色。张已经明白，他是不可能说服蒋介石的。仅停了一日多，张季鸾又匆匆地离开了庐山，离别时他深深地为张学良的命运和前途而悲叹！

后语

1986年，正值张季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台湾举办了大型活动，张季鸾的儿子张士基先生应邀参加。期间张学良将军与张士基会了面，张将军并没有多谈西安事变，而在张士基面前背诵了1936年12月18日《大公报》社评《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畅如流水，毫无错误。张将军说该文是王芸生写的，其实是张将军记错了，这正是张士基的父亲张季鸾所写。事情虽小，却可看出，该社评对张学良将军影响之深。

张季鸾最为后来人所诟病的，是在西安事变后，他准备请一个号称“刘神仙”的医生，给蒋介石治腰伤，这事虽未成，但在1949年以后闹得沸沸扬扬，他们称张“亲蒋”、“媚蒋”。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常人，腰伤也是要治的。

1980年王芸生去世前，对本文作者说，“我们这边儿，简直把张学良说成是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其实他是大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张作霖把中共领袖李大钊杀了；咱们这边呢？在文革中，张学良胞弟张学思，让海军造反派活活斗死。当然日本鬼子把其父杀了，又把他本人赶出东北。他当然痛恨小日本。依我看，张学良是‘国恨家仇’，而称不上‘千古英雄’。”

西安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七十年了，有关的争论仍在继续。本文介绍《大公报》对西安事变的看法给读者，确乎？谬乎？有待读者进一步思考。

注一：到底带多少张报，各处的说法都不一样，有的差别很大，如有人说带了上百万张。笔者以为徐铸成著《报人张季鸾先生传》的说法比较接近实际（见该书第127页），故引之。

注二：陈纪滢是邮局工作人员，从1931年起一直以客卿身份在《大公报》担任职务，长达15年之久，是编外记者，为报社作了大量工作。1949年随国民党政府去了台湾，曾任台湾笔会中心主席。他的三本有关《大公报》著作：《报人张季鸾》、《胡政之与大公报》、《重庆时代的大公报》等，使其在海外颇有些名声。

作者简介：

王芝琛，王芸生之子。1937年9月出生，1955年9月毕业于北京第25中（即原育英中学）。1961年9月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长期在海军工程院从事教育及教育科研工作。1991年提前退休，从事《大公报》报史研究。

给西安军界的公开信（《大公报》社评）

陕变不是一个人的事，张学良也是主动，也是被动，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的空气，酝酿着，鼓动着，差不多一年多时间才形成这种阴谋。现在千钧一发之时，要釜底抽薪，必须向东北军在西安的将士，剴切劝说。我们在这里，谨以至诚，给他们说几句话：

主动及附和此次事变的人们听着！你们完全错误了。错误的要亡国家，亡自己。现在所幸尚可挽回，全国同胞，这几天都悲愤着焦燥着，祈祷你们悔过。

东北军的境遇，大家特别同情，因为是东北失后在国内所余唯一的军团，也就是九一八国难以来关于东北唯一的活纪念。你们在西北很辛苦，大概都带着家眷，从西安到兰州之各城市都住着东北军眷属，而且眷属之外，还有许多东北流亡同胞来依附你们。全国悲痛国难，你们还要加上亡家的苦痛。所以你们的焦燥烦闷，格外加甚，这些情形，是国民同情的。蒋委员长明知你们空气不稳，而一再到西安，对你们始终信赖，毫不防备，也就

是因为特别同情你们之故。

你们大概听了许多恶意的幼稚的煽动，竟做下这种大错，你们心里或者还以为自己是爱国，那知道危害国家，再没有这样狠毒严重的了。你们把全国政治外交的重心，全军的统帅，羈禁了，还讲什么救国！你们听不见绥远前线将士们，突闻陕变，都在内蒙荒原中痛哭吗？你们不知道吗？自十二日之后，全国各大学，各学术团体，以及全国工商业实业各界，谁不悲愤？谁不可惜你们？你们一定妄信煽动，以为有人同情，请你们看看这几天全国表示，谁不是痛哭！就使诚心反政府，想政权的人，在全国无党无派的大多数爱国同胞之前，断没有一个人能附和你们的。因为事实最雄辩，蒋先生正以全副精神，领导救国，国家才有转机，你们下此辣手。你们再看看全世界震动的情形！凡是同情中国的国家，没有不严重关心的。全世界的舆论，认定你们是祸国，是便利外患的侵略！因为这是必然的事实。蒋先生不是全智全能，自然也会有招致不平反对的事，但是，他热诚为国的精神，与其领导全军的能力，实际上成了中国领袖。全世界国家，都以他为对华外交的重心。这样人才与资望，再找不出来，也没机会再培植。你们制造这阴谋之日，一定能预料到至少中央直属的几十万军队，要同你们拼命，那么你们怎么还说要求停止内战？你们大概以为把蒋先生劫持着，中央不肯打你，现在讨伐令下了。多少军队，在全国悲愤焦虑的空气中，正往西安开。你们抗拒，是和全国爱国同胞抗拒。你们当中，有不少真正爱国者，乃既拼了命而祸了国，值与不值？

所幸者，现在尚有机会，有办法，办法且极容易，在西安城内，就立刻可以解决。你们要从心坎里悲悔认错！要知道全国公论不容你们！要知道你们的举动，充其量，要断送祖国的运命，而你们没有一点出路。最要紧的，你们要信仰蒋先生是你们的救星，只有他能救这个危机，只有他能了解能原谅你们！你们赶紧去见蒋先生谢罪吧！你们大家应当互相拥抱，大家同哭一场！这一哭，是中国民族的辛酸泪！是哭祖国的积弱，哭东北，哭冀察，哭绥远！哭多少年来在内忧外患中牺牲生命的同胞！你们要发愤，从此更精诚团结，一致的拥护祖国。你们如果这样悲悔了，蒋先生的泪一定更多，因为他为国事受的辛酸，比你们更多几十倍。我们看他这几年在国难中常常有进步，但进步还不够。此次之后，他看见全国国民这样悲忧，全世界这样系念，而眼前看见他所领导指挥的可爱的军队大众，要这样牺牲，而又受你们的感动，他的心境，一定要自责自奋，绝不怪你们。从此之后，一定更要努力集思广益，负责执行民族复兴的大业。那么，这一场事变，就立刻逢凶化吉转祸为福了。你们记住几句话：（一）现在不是劝你们送蒋先生出来，是你们自己应当快求蒋先生出来。（二）蒋先生若能自由执行职务，在西安就立刻可以执行。你们一个通电，蒋先生的一个命令就解决了。（三）切莫要素保证要条件。蒋先生的人格，全国的舆论，就是保证。你们有什么意见，待蒋先生执行职务后，尽可以去贡献，只要与国家民族有利，他一定能采纳，一定比从前更要认真去研究。（四）蒋先生是中央的一员，现在中央命令讨伐，是国家执行纪律。但我们相信蒋先生一定能向中央代你们肯求，一定能爱护你们到底。

我们是靠卖报吃饭的，谁看报，也是一元法币一月，所以我们无私心。我们只是爱中国，爱中国人，只有悲忧目前的危机，馨香祷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败。今天的事情，关系国家几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运，现在尚尽有大家成功的机会，所以不得不以血泪之辞贡献给张学良先生与各将士。我想中国民族，只有彻底的同胞爱与至诚能挽救。我盼望飞机把我们这一封公开信快带到西安，请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气而为祥和。同时请西安的耆老士绅学生青年，都快去求他们照这样做。这是中国的生路，各军队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万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国，这几天都以殷忧的目光，望着西安阴郁的天空。赶紧大放光明吧！万万不要使华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国历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纪念！我们期待三天以内就要有喜讯，立等着给全国同胞报喜。

张学良的叛国 胡适

我刚从海外回来。我在国外，眼看见美国的舆论对中国的态度在最近几个月之中逐渐好转。到十月以后，国家的统一形态更显明了，对强邻的态度更严正了。十一月九日美联社的社长何华德先生从马尼拉发出一个长电，对新兴的中国表示由衷的赞叹。他说：“对这个更生的，统一的中国，欧美人的评判必须改变修正了。向来外国人认为不可能的统一，今天已是一件无疑的事实了。”

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乐观回来，万不料回国刚刚十二天，就遇着了张学良在西安叛变劫持统帅的恶消息！我个人精神上的大打击自不消说；全世界的震惊，我们的国家民族在国际的地位骤然低落，只有我们刚从国外回来的人才能充分感觉到。我们又要许多时不能抬头见人，不能开口说响话了！

张学良和他的部下这一次的举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害国家民族的进步，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奇怪的是今日还有一部分的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那些人不是居心危害国家，必是无知无识。居心危害国家的人，唯恐国家不乱，因为只有纷乱的状态之下他们可以在浑水里摸鱼，达到他们危害国家的目的。那种人我们可以撇开不谈，因为他们的头脑早已硬化了，什么话都听不进去。至于知识幼稚的青年，他们本是抱着爱国血诚的，只因为情绪太兴奋，忍耐心太薄弱，不明了事实，总感觉到政府对外太软弱，总疑心到政府的领袖有对不住国家的心思。这种错误的感觉到现在应该可以消除了。五年的忍辱不战，所求的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整齐的步伐，充实的力量。性急的青年虽然看不到这一点，我们的强邻可早就明白了。去年九月二十四日出现的所谓“多田宣言”就很明白的说：要之，蒋介石及其一党与日本帝国之关系，帝国屈伏乎？抑帝国打倒彼辈乎？

我们的青年人应该仔细想想这几句话的涵义。我们的强邻早已认清蒋介石先生领导之下的政府是最可怕的力量，所以他们处心积虑要打倒那个力量。所以凡危害那个力量的行为，都是自坏我们国家民族的抗拒力量，都是危害我们自己的国家，戕贼我们自己的民族，——都是叛国祸国。

特别是在这个绥远前防已开始作战的时期！全国的人民应该明白：这回绥远的作战是第一次由统一的中央政府主持领导的战争。中央的部队已到了前线，军政部次长陈诚已受命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了。这回作战的第一步计划当然包括三个子目：第一是绥北绥东的肃清，第二是察北察东的收复，第三是冀东的收复。正在这第一个子目还没有做完的时候，正在陈诚次长受命指挥的第二天，张学良忽然造反了，把一个关系全国安危的领袖蒋院长拘留了，把前一天受命指挥绥东国军的陈诚次长和别的几位重要官吏与将领也拘留了！说这是为的要“抗日”，这岂不是把天下人都当作瞎子傻瓜！

这回的西安事变，是叛国祸国，毫无疑问。一个政府有铲平叛乱的当然责任，也毫无疑问。政府得到西安叛变的确报之夜（十二夜），立刻举行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的联席会议，议决行政院由孔副院长负责，军事委员会由冯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并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张学良免职的国府令是十二夜下的，到十六日国府才下讨伐张学良的命令。政府的讨伐令所以迟到四天之后才下，大概是因为蒋院长等被困在西安，政府不能不存“投鼠忌器”的疑虑。现在讨伐令已毅然发表了，我们当然赞成政府的处置。十二夜政府的决议是健全政府本身在非非常时期的组织；十六日的讨伐令是全国的要求，我们都认为很正当，很得体的处置。我们现在只希望政府坚持这个立场，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勘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

到营救蒋陈诸先生的目的。这不是不顾蒋陈诸先生的安全。我们要彻底明白，凡奸人劫持绑票，正是要人“投鼠忌器”，只有坚持不受要挟不赎票的决心，方才可以使他们所挟劫质的全归无用。一切迟疑顾忌，都正是奸人所期望的！

蒋介石先生在今日中国的重要，真是如傅斯年先生说的“无可比拟的重要”。西安叛变的突然发生，使全国爱护国家的人们格外感觉到这个领袖的重要。在这几天之中，我见着了至少两三百个来客，有的是白发的学者，有的是青年的学生，有些是平日爱护蒋先生的，有些是时常批评他的，——但在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异口同声的关切蒋先生的安全，都在愁苦焦急的到处探听可靠的消息。一切政见的异同都丢在脑后了，大家只感觉这是一个有能力有办法的领袖是一身系国家的安危的，我看见一个北大一年级的学生在十三的早晨真是焦急的要发疯；我知道两个十一二的小孩子真急的大哭。这种现象，在这个最不崇拜英雄的民族里，真是最难得的奇迹。这样爱护的热心，不是宣传的力量造成的，也不是武力威权招致的，是最近两三年坚忍苦干的事实逐渐得国人明了认识的自然效果。在他患难之中，全国人对他表示的敬爱与关怀，那才是最真诚的表示，是利禄与威权买不来的好意。

我们在此刻所能确信的消息是端纳先生曾飞到西安，亲见蒋先生平安无恙。我们祝他平安出险。我们深信他平安出险是毫无疑问的。